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成都的厕所卫生建设及其经验启示[※]

●马先睿 焦存超

“小厕所,大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厕所革命”问题,强调厕所卫生建设“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1]。厕所卫生建设的客观实效,不仅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同时更关系到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与社会文明的进步。在推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的进程中,成都始终走在“厕所革命”的前线。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伊始,成都就坚持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积极探索厕所卫生建设事业,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为今天成都的环境卫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党带领人民治蓉兴蓉的个案缩影,有关这一历程的回顾与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职业群体、厕所设施和制度法规三个维度,系统梳理和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成都厕所卫生建设的发展过程,提炼其

中的历史经验,为今天进一步改善成都城乡居民卫生环境、继续推动成都的“厕所革命”以及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历史的借镜。

一、职业群体的演进:从基层粪夫到专职“所长”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成都市民多以马桶作厕,家庭粪便的清运基本依靠粪夫这一特殊的职业群体。他们有的受雇于市内粪商,帮助其收运粪便加以倒卖,有的则来自成都市郊,通过向各街住户包佃或临时收买散粪供自己使用。作为成都最早的一批厕所从业者,粪夫这一群体的形成其来有自。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大幅增加,使日常粪秽总量逐日加大,在公厕数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需要人力专司运送和处理粪便。另一方面,旧时农业生产高度依赖人之粪尿作为肥料,成都农民普遍视“粪秽如金钱”,使得专门收集市内粪秽用以交易成为一桩大有利可图的买卖。正因如此,以粪夫为业者最低可解基本生存

91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47(2019)06-0091-06

[收稿日期]2019-10-15

※基金项目:成都市社科规划项目“建国70年来成都厕所卫生建设及其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019L03)研究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重视角下的晚清至民国中国城市粪秽处理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8BZS104)部分研究成果。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带领下,成都厕所卫生建设取得了瞩目成就。就职业群体来看,成都的厕所从业人员完成了从底层雇工到企业职工再到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转变,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就厕所设施而言,现代化水厕和居室卫生间取代老旧旱厕成为市民如厕的常规配置,厕所内外部卫生环境和硬件设施水平发生极大变化。就法规制度观之,全新的厕所建管模式日趋成型,实现了从求量到求质、由粗泛到细致的演进。有关这一历程的梳理及其蕴藏经验的挖掘,对于今天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厕所革命”重要指示精神、继续推进成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厕所卫生建设;成都;新中国成立70年;厕所革命

作者简介:马先睿,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四川成都 611756);焦存超,长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历史。(重庆408100)



成都行政学院
JOURNAL OF CHENGDU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学报

之需要,幸运者亦可由此获利。但是,由于作业环境恶劣且缺乏保护措施,粪夫中多有感染疾病或中毒者,而且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早在1947年发行的成都《民友》杂志中就曾形容道,“粪夫所业,在俗眼看来,是极卑贱,极肮脏”^[2]。1952年成都市人民政府组织工人座谈时,仍有老粪夫编出顺口溜哭诉过去的悲惨遭遇:“长年住粪坑,粪夫疾病生。医病无分文,惨死在粪坑”^{[3]86}。由此可见粪夫职业的辛酸。

成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人民政府将粪便肥料划为生产资料,加强了对粪便清运及其流向的管理。随着公私合营事业的铺开,基层粪夫逐步被吸纳为肥料公司全民所有制职工。截至1952年底,由粪夫转变为粪肥职工者达二百余人。^{[4]77}与此同时,肥料公司还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招收百余名公厕卫生管理员,协同清洁部门负责街道厕所的保洁工作。经过不断改组和发展,成都出现了一支由专业清运队和公厕管理员共同组成的厕所从业群体。相较过去粪夫行业的松散和凄苦,公私合营后的厕所从业群体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组织更加严密,工作内容相对固定。在清洁管理所^①的统筹管理下,他们既包揽了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公厕的清洁工作,还要负责收运街道和居民院落的零散粪便。二是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得到极大改善。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清管所职工月收入平均保持在40—50元,公厕管理员则按负责的公厕数量发以大米(后改为现金)。他们中表现优异的,还有机会被选为劳动模范加以表彰。有获奖职工就曾感慨,“人民政府这样关心我们,过去我们做的真不够,此后我们一定要做好卫生工作,保障我们的健康”^[5]。可以说,厕所从业群体在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转型,不仅促成了这一职业群体身份的转换,同时为成都的厕所卫生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力依托。

尽管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中期,成都的厕所从业群体曾一度受到社会氛围影响而疏于日常工作^②,但总体上看,他们仍是全市厕所卫生建设的主力。改革开放以后,市清管所改制为环境卫生管理处,原清运队和公厕管理员编入环卫工人队伍。由于定人、定量、定级管理制度的实施,相关从业人员数量逐年递增。特别是1990年成都开展创建卫生城市活动后,市内各级环卫部门正式职工增至约3700人。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有2065人,集体所有制职工有1627人,共占城区常驻人

口的0.25%。^{[6]79}此外,每年环卫部门还对外招聘临时工数百人,协助街道厕所的保洁卫生工作。伴随市民居住条件的改善以及水冲式厕所的普及,城区家庭粪便不再由清运队负责收运,改由居室卫生间或街道公厕直接排入化粪池。郊县及农村地区也因化肥的普遍使用,其粪便改由当地环卫部门进行有偿除运。在这种情况下,成都厕所从业群体的功能进一步单一化,逐渐向专职的城区公厕维护群体嬗变。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成都城区的厕所从业群体多由公厕管理员和保洁员为主,公厕也基本形成一人管理一厕或多人管理一厕的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响应党和国家关于实施“厕所革命”的号召,成都市政府积极探索城市公厕的职业化和市场化管理,率先在全国试点“以商建厕、以商养厕、以商管厕”的创新模式。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锦江区、成华区先后将辖区内的280多座城市公厕集中打包,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将管理权下放。在职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下,成都的厕所从业群体中出现了过去没有的全新身份——“厕所职业经理人”。这群被民间谑称为“所长”的厕所从业者,其工作内容和范围较过去更加广泛。以成华区为例,在该区下辖的8个片区共108所公厕中,每个片区均配有1名专职“所长”,每座公厕配备2名保洁人员。“所长”每天要监督保洁人员完成天花板、蹲位、牛皮癣、消毒等23项保洁流程,区域扩展到周边10米的公共区域。为保证保洁标准化的有效实施,他们还要面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到场巡查和定期考核。“所长”实行聘任制,任期为3年。公厕保洁情况及设施维护情况考核连续不达标者,将予以解聘。环卫所还将依据市城管局每月的公厕考核排名、是否被媒体曝光等标准,对多次处于末位或被媒体曝光2次以上的“所长”进行淘汰。^[7]厕所从业群体的转型与成都厕所卫生建设的发展相伴相生,而“厕所职业经理人”的出现,标志着成都厕所卫生建设事业已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二、厕所设施的改良:从旱厕到“五星级公厕”

成都解放时,市内共遗留民国时期的大小公厕六百余座。这些公厕全为旱式厕所,且“因建筑不善,兼一般市民不到厕内即开始溺便,以致亚摩利亚气四溢”^[8],给成都的城市卫生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1950年3月,在人民政府的组织下,群众积极参与市内公厕的修补粉刷

工作,主动投撒石灰进行消毒。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兴起后,市卫生局统一整治街道和机关单位公厕1623座,改善家庭小厕2342座,取缔封闭厕所453座,在城区新建公厕7座、家庭小厕109座,增开男女厕所75座,并在全市5560座厕所中杀蛆14610次,杀蛆量达4.708吨。^[9]据《成都市志》记载,这批新建厕所大多位于炮场坝街南口、锦华馆街附近,建筑面积一般在70—90平米,蹲位成放射状排列,地面和粪坑用砖或三合土垫铺。每座公厕造价约旧人民币4千万元,其中望江公园内公厕修建和改造首次使用水泥替代三合土。^{[10]65}此后,居民院落、各单位厕所的粪坑也开始少量使用水泥。20世纪50年代爱国卫生运动中对厕所的整治,极大改善了新中国成立后成都市民的如厕条件以及卫生环境。

20世纪60年代以后,成都城区开始大规模改建无害化旱式街道公厕。其中,仅1960年一年时间,就修改二连式厕所23座,梭槽式厕所36座,漏斗形厕所3座。此外,市卫生局还在郊县推广密封斗式厕所,即以各粪池的隔墙为屏,在旧粪坑的基础上改建成一坑三池的方斗形无害化厕所。截至1979年,成都全市共翻新改建街道公厕119座。同年统计,市内街道公厕已达551座,共有男女蹲位6209个。^{[11]65}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成都的公厕设施质量仍然较为落后,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男女蹲位的配比上看,男多女少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这给妇女同志如厕带来了诸多不便。二是从厕所类型上看,新建和改建的公厕仍以旱厕居多。城区内除各单位修建楼房配套修有水冲式厕所外,街道公厕几乎全是旱式厕所。加之受当时特殊的社会氛围影响,厕所从业群体消极怠工者众多,导致厕所粪便积压、蝇蛆繁殖,如厕环境日趋恶劣。尽管1973到1975年间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一再发布整顿城市粪便管理的通告,督促厕所的清洁卫生工作,但实际成效不佳,并未彻底改变成都厕所设施落后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水冲式厕所开始逐步取代旱厕普及开来。1983年3月,成都市政府颁布施行《成都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暂行办法》,对市内公厕的新建、改建和拆迁做出了详细规定,强调对公厕设施进行改良和更新。此后,水厕在机关、部队、学校、工厂等单位和公园等公共场所随新建建筑物而普遍采用。至1990年底,城区水冲式厕所增至5538座,其中街道水

冲式公厕建成213座,其中包括三格化粪池式公厕141座,沼气化粪池式公厕72座。^{[12]67}相较旱厕而言,这些水厕造价更高,一般每平方米600至800元不等,普遍采用磨石地面,并以瓷砖作为墙面和尿槽,厕内设自动水箱,每20分钟自动冲洗一次,并保持粪尿槽内有一厘米深积水,粪便经三格化粪池直接排入下水管网。此外,有的厕内还设洗手池、挂衣钩、整容镜等,如厕环境得到大幅改善。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城区改造的不断推动,市民居住条件随之提升,部分街道、居民院落以及工厂宿舍区等公共场所残存的旧式旱厕全部改建为水冲式厕所。除极少数家庭仍以痰盂代厕,绝大多数家庭中均已配置居室卫生间。

近年来,成都市政府明确提出“布局科学、数量达标、管理规范、服务优质、群众满意”的目标,着力提升公厕规划建设的管理服务水平,持续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仅2017、2018两年时间,成都就新建公厕530座,改造投用旧厕900座。在“厕所革命”中,成都重点突出了厕所设施的人性化改造,不仅大幅提高了女性厕位比例,增设了第三卫生间、无障碍设施以及母婴设施和儿童便器等,同时在改造过程中因地制宜地提升了公厕通风、采光和除臭条件,美化了公厕内外环境。全市1878座环卫公厕均提供便民服务,厕所信息通过成都地理信息公共平台、成都城管APP向公众发布。^[13]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公厕由于装修条件较好、环境舒适,并配备有干手器、沙发、冰箱、饮水机等设备,在民间享有“五星级公厕”的美誉。厕所设施的改良是一项民生难点,体现着文明进步的尺度。从旱厕到“五星级公厕”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于民生事业以及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度重视。

三、法规制度的完善:从粗泛到细致

成都解放后,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厕所卫生建设事业,并参照革命根据地以及其他较早解放城市开展群众卫生工作的经验,在成都先后建立了各级专司机构。1950年2月,成都市临时卫生委员会挂牌成立,4月又新设成都市卫生局,其职责之一即是领导全市的粪便除运以及公厕管理工作。同年6月,市卫生局相继公布《成都市厕所、粪坑管理暂行办法》《成都市清洁管理暂行办法》等重要办法,一方面保留了旧清洁规定中的合理部分,另一方面把群众维护清洁卫生的优良经验以法规形式加以固定,



同时把厕所的日常清洁工作与爱国的社会义务联系起来,促进清洁卫生工作和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1953年开始,在市政府的领导下,肥料公司还对下辖街道公厕制定了定时、定额的管理制度,规定厕所必须由专人负责打扫,同时做到按时除运、按时保洁,并展开每周一次的检查和记录。1958年8月,市人民委员会在1950年暂行办法的基础上,修订发布《成都市粪便垃圾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全市粪便、厕所的管理要求。此后,市清管所、市爱委会、市除七害突击运动指挥部等部门也都相继制定了城区厕所的清洁规则。^[14]通过一系列法规制度的规范,成都厕所卫生建设稳步推进,城市的厕所卫生环境较解放前焕然一新。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如表1所示,成都厕所卫生建设的相关法规层出不穷。然而,在具体细节上,诸如厕所卫生建设的主管部门及其责任、厕所环境的验收标准和监管维护、厕所管理的规范化运转、厕所保洁的奖惩制度等方面,这些法规内容仍然相对粗泛,偏于强调从“量”上定性厕所卫生建设的成效。在这种情况下,每日除运的粪量有多少、杀蛆次数多少次、改建的厕所有几座、清理的垃圾有几何,成为这段时期相关制度法规的主要限制条文。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囿于当时成都的经济条件,厕所清洁工作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譬如1963年市卫生局再次修订的《粪便垃圾管理暂行办法》、1965年市爱委会、市卫生局联合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粪便管理工作的几点意见》、1966年市卫生局发出的《关于整顿城市粪便管理工作的几项决定的通知》等,都突出了厕所粪秽对于支农用肥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客观环境下,人民政府主要依托群众运动的方式推进厕所卫生建设。无论是1952—1959年间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还是“大跃进”以后的数次除害运动,无一不是通过发动群众在全社会推广相关活动的。这固然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作用,却也难免带来盲目求进、相关部门职能界限不清的局限。(见表1)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都市政府转以“质”的改善替代“量”的累积,相关制度法规日臻完善。从1981年开始,《成都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暂行办法》《成都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成都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实施细则》等先后出台,通过以法治脏、执法督脏、标本兼治,综

表1 成都20世纪50—70年代厕所卫生建设主要法规一览表

发文日期	法规名称	发文单位
1950年6月	成都市厕所、粪坑管理暂行办法	市卫生局
1950年6月	成都市清洁管理暂行办法	市卫生局
1951年8月	成都市公共厕所粪坑管理暂行办法	市卫生局
1953年1月	成都市1953年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要求	市卫生局
1954年5月	关于厕所粪坑清洁卫生与管理工作的决议事项	市卫生局
1954年7月	关于修改1951年<成都市公共厕所粪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卫生局
1958年8月	成都市粪便垃圾管理暂行办法	市人委
1958年11月	改造公厕卫生办法	市清管所
1960年3月	关于新建厕所规定	市除七害突击运动指挥部
1963年7月	修改成都市粪便垃圾管理暂行办法	市卫生局
1965年6月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粪便管理工作的几点意见	市爱委会;市卫生局
1966年1月	关于整顿城市粪便管理工作的几项决定	市卫生局
1971年10月	转发市卫生局革委会“关于城市厕所维修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
1973年8月	关于整顿城市粪便管理的通告	市革委会
1975年7月	关于整顿城市粪便管理的通告	市革委会

合解决成都的厕所卫生问题。相较过去而言,改革开放以后成都厕所卫生建设的相关制度法规更加细致,不仅明确了厕所卫生建设的主管部门,界定了各级职能部门的责任权限,同时对于城区街道公厕的定人、定量、定级管理制度以及保洁质量的“七无七净”标准做出了合理规划,探索了公厕保洁、使用的有偿服务制度。这一方面得益于成都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使粪肥在农业中的作用日渐式微,而粪秽处理技术的不断进步也促使厕所卫生建设方式日益多元。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的重心从群众运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成都市政府在领导厕所卫生事业的过程中,改以法规制度等长效机制建设取代一般性的群众动员,以利于建设效果的稳定持久。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动“厕所革命”的进程中,成都厕所卫生建设的相关制度法规进一步细化,逐步朝向市场型、服务型的方向发展。2017年底,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成都市城乡“厕所革命”实施方案》,其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成都市公厕管理实施办法》等法规的修订工作,并从科学规划布局、强化建设改造、加强管理服务、建设智慧公厕、创新建管模式等方面对新时代成都的厕所卫生建设做出了制度安排,强调探索构建方式灵活、运转高效的多元供给体系和厕所建管长效机制。正如成都市长罗强指出的,“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关

系大文明,要切实增强推进‘厕所革命’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攻坚克难、狠抓落实,以‘厕所革命’为起点,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一件接着一件抓,一年接着一年干,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5]。成都厕所卫生建设制度法规的不断完善,不仅为成都的厕所卫生事业提供了坚强保障,同时立足于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体现了党和国家推动厕所卫生建设的价值依归。

四、小事中的大情怀:70年来成都厕所卫生建设的经验启示

民生存在于每一件小事,千万人的小事就是一件大事。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成都人民浴蓉兴蓉的过程中,在厕所卫生建设这一攸关市井民生的重要事业上取得了瞩目成就。就职业群体来看,成都的厕所从业人员完成了从底层雇工到企业职工再到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转变,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确保了厕所卫生建设事业的稳步推进。就厕所设施而言,现代化水厕和居室卫生间取代老旧旱厕成为市民如厕的常规配置,厕所内外部卫生环境和硬件设施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针对老弱妇孺、残障人士和第三性别者的人性化厕所也相继出现。就法规制度观之,全新的厕所建管制度日趋成型,实现了从求量到求质、由粗泛到细致的演进,为成都厕所卫生建设事业提供了坚实保障。如今回望这段岁月,其中的历史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厕所革命”重要指示精神、继续推进成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其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开展厕所卫生建设的根本旨归。“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如厕事微,却关乎日常生活的体面与尊严;厕所虽小,却能真实体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新中国成立以来,成都市政府始终坚持从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出发,经过一系列艰苦探索和建设,补齐了厕所卫生这一影响市民生活品质的短板。无论是从业群体的身份改造,还是设施环境的日益改良,或是配套法规制度的不断完善,都体现了人民政府以人民为中心、致力改善民生的执政理念,不仅赢得了市民的一致好评,同时极大提升了人民群众在如厕这一小事上的获得感、幸福感、舒适感。实际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16]。解决好每一个攸关人民日常生活的点滴问题,切实提升每一个人的生活品质,有效改善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情况,就是在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成都的厕所卫生建设以及今天轰轰烈烈的“厕所革命”,意义都正在于此。

其二,厕所卫生建设要注重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但要避免完全仰止于群众运动。毛泽东早就指出,“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17]。从70年来成都开展厕所卫生建设的历程来看,党和人民政府充分贯彻了以群众为主体的原则,让市民不仅成为厕所卫生建设的受益者,更促其化身为这一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通过发动群众的方式,一方面极大激活了群众中蕴藏的无穷力量和智慧,加速了厕所卫生建设的实绩,另一方面切实提升了群众认识,使建设效果得以在群众的自我约束中长久保持。可以说,依靠群众而又善于领导组织群众,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成都厕所卫生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关键。但必须指出的是,群众运动固然有助于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因其本身的特殊性质,不能将之视作唯一的路径依赖。譬如20世纪50年代的历次爱国卫生运动中,就曾一度由于盲目求进、追求运动的气势和速度,使成都的厕所卫生建设因为脱离实际而带来一系列负面问题。直到今天,这仍是一条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

其三,创新运营管理对于推动厕所卫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结合成都的客观条件,大胆尝试管理模式创新,使厕所卫生建设在稳步推进的同时,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譬如在全国首创厕所“职业经理人”制度,依托人性化管理和现代科技推进星级公厕落地,率先引入“以商建厕、以商养厕、以商管厕”的全新建管模式等,都体现了改革创新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立足新的实际,不断从内容、形式、载体、方法、手段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创新,善于以新的经验指导新的实践”^[18]。实际上,这对于新时期的厕所卫生建设尤为重要。一方面要积极开动脑筋,不断创新管理,在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的双重拉动下,推动厕所建设和管理的长效化、常态化管理,实现了厕所管理责任到位、免费使用、干净卫生等日常养护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通过大力推广信息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在厕所革命



中的运用,推动厕所建设和管理,实现“小厕所的高科技”。通过探索建管结合、创新运营厕所管理方式,使新时期的厕所卫生建设逐步形成强大的纵深发展动力,这对提升厕所数量和质量,推动“厕所革命”从阶段性集中推进顺利转入持久性、常规性建设运营轨道具有深远意义。

当然,也必须认识到,厕所卫生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其他各项环境卫生建设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如果将视野跳脱“卫生间”及其周边的有限事象,将厕所卫生建设与更为繁杂的水资源利用、废水回收处理、社会公共性缺失等问题联系起来,目前的厕所卫生建设仍然存在诸多值得改善的地方。有学者就指出,“无论中国的厕所文明已经和将要发展到怎样的高度,它也无法避免地具有脆弱性,这是因为支撑着现代厕所文明的基础设施,亦即复杂的城市上下水道体系,原本就始终是脆弱的”^[19]。立足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还需要在充分汲取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宝贵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推进厕所卫生建设,打赢新时代“厕所革命”这场硬仗。这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务实之举的战略需要,同样也是中华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作为关乎民生福祉的重要事业,厕所卫生建设还有一段漫长之路要走,仍需吾辈继续上下求索。

注释:

①成都清洁管理所简称“清管所”,成立于1958年6月,由原肥料厂杂肥管理科与市卫生局清洁大队合并而成。

②这一时期,由于受到特殊社会氛围影响,部分工人消极怠工,导致公厕粪便不能及时除尽。个别工人甚至出现不守规定、违规除粪的现象,致使除粪工具疏于清理、粪桶沿街洒漏,影响了成都的市容环境。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短板[N].人民日报,2017-11-28.
- [2]陈筑山.释迦与粪夫[N].民友第5号,1947-7-1.
- [3][4][6][10][11][12]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志(环境卫生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 [5]成都市爱卫会.成都市爱国卫生运动给奖大会总结报告[B].成都市档案馆,127-001-0577.
- [7]李晨.成都首批公厕“所长”上岗,一旦考核不过关就将下岗[N].成都晚报,2018-8-10.
- [8]周芷颖.新成都[M].成都:复兴书局出版社,1943:209.
- [9]成都市爱卫会.成都市爱国卫生委员会工厂分会工作总结[B].成都市档案馆,127-002-1236.
- [13]李霞.成都两年内新建改造公厕1430座[N].成都日报,2018-8-23.
- [14]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关于“成都市粪便垃圾管理暂行办法”的布告[B].成都市档案馆,081-001-412.
- [15]黄鹏.罗强主持全市推进“厕所革命”工作专题会[N].成都日报,2017-12-5.
- [1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0.
-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33.
- [18]习近平.在纪念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6.
- [19]周星.“污秽/洁净”观念的变迁与“厕所革命”[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1).

责任编辑 杨 阳